

## 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研究論介

莊兵\*

### 摘要

分藏於法、英、俄等圖書館的敦煌寫卷《孝經》已經由學者整理出五十餘件，還有吐魯番出土文書發現的《孝經》相關殘卷二十件，合計超過七十件。所見卷本，絕大多數為白文《孝經》，另有鄭玄的《孝經注》、唐玄宗的《御注孝經》，以及十數卷佚名的《孝經注》、《孝經解》、《孝經疏》、《孝經讚》以及近十件《孝經》策問卷。這些《孝經》寫卷中，不少存有紀年題記，從抄寫時期看，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皆有，其間橫跨五個世紀。六朝隋唐這一段《孝經》講習極為活躍，卻少有資料保存下來，由於寫卷中發現諸多前所未見的文獻，為《孝經》從輯佚校勘的文獻學研究至思想、民俗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補充及新課題的開展。對此範疇的研究，王重民、黃文弼、林秀一、蘇瑩輝、陳鐵凡、王利器、陳金木、榮新江、任半塘、嚴耀中、柳洪亮、鄭阿財、許建平、王素、李德超、張錫厚、趙楠、劉波、金澄坤等學者有代表性成果，使敦煌吐魯番本《孝經》從個案性的綴合定名，至綜合性的輯佚校勘等，皆有深入長足發展。本論是對這些成果的初步整理介紹，期望為《孝經》研究提供一個觀察視角。

---

\* 莊兵現職為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曾以題為〈敦煌本《孝經》研究論介〉於2014年5月17日在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近現代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做出宣讀。承蒙陳逢源教授、楊明璋教授以及未具名審查者精審寶貴的建議，使本文的考察得以大幅修正與擴充。在論文撰寫過程中，還承蒙華梵大學佛教學系釋大參法師提供寶貴的研究資料，並獲得國立政治大學陳睿宏教授的鼓勵與推薦，值此一併敬表謝忱。

## 引言

20 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了五萬餘件書寫於西元 5 至 11 世紀的文獻，成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發現。對於這些文獻的研究整理，形成專門的敦煌學，自 1909 年中日學者相繼刊行相關敦煌文獻研究論著，<sup>1</sup>迄今敦煌學已走過百年的學術歷程。在這些絕大多數為佛教寫經的卷子中，存有三百餘件儒家典籍，《孝經》亦在其內，是發現數量僅次於《論語》的儒家經籍。<sup>2</sup>

至今，分藏於法、英、俄等國家圖書館的敦煌寫卷（伯希和編號以 P. 開頭、斯坦因編號以 S.、俄敦編號以 Дх. 開頭），《孝經》（包含歌詠、頌讚類）經由編目解題或個卷研究，已經由學者整理出五十餘件。從這些多為學郎、考生抄寫的各種卷本來看，絕大多數為白文《孝經》，另有鄭玄《孝經注》、唐玄宗《御注孝經》，以及十數卷佚名的《孝經注》、《孝經解》、《孝經義》、《孝經疏》、《孝經讚》等。其中編號為敦研 0366 號寫卷末題記有「和平二年十二月六日，唐豐國寫此孝經」的字樣，「和平二年」指北魏和平 2 年（461），此亦為敦煌寫卷中標示年代最早的寫卷。<sup>3</sup>最晚的是五代時期後晉天福 7 年（942）的編號 S.1386 號《孝經》殘卷，<sup>4</sup>卷末有題記「維天福

<sup>1</sup> 1909 年 9 月羅振玉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東方雜誌》第 6 卷 11、12 期）；同年 11 月 12 日《朝日新聞》發表內藤虎次郎〈敦煌石室發見物〉一文，成為分別成為中日敦煌學研究的開端。

<sup>2</sup>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之〈卷七·論語〉頁 290-386，統計出敦煌《論語》寫卷共 74 號，綴合成 60 件；〈卷八·孝經〉頁 387-429，統計出敦煌《孝經》寫卷共 41 號。這僅是藏經洞發現的數量。據筆者統計，若加上土地廟遺書 1 號、吐魯番出土的《孝經》寫卷 12 號，則西域地區出土合計 54 號。其他還有敦煌寫卷：歌詠、頌讚《孝經》類殘卷 10 號、學郎《孝經》策論草稿 2 號綴合成 1 件；吐魯番出土：考試時學生所答《孝經》策問卷 8 號。這樣，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寫本合計已達 74 號。另有疑偽的「首都博物館藏白文《孝經》1 號」未計在內。相關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寫卷統計細目，請參看本論〈附錄：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寫卷一覽表〉。相關藏經洞出土敦煌儒家類寫卷狀況，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一書，賅博詳實，可資參照。

<sup>3</sup> 圖版參見蘇瑩輝：《敦煌學概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8 年），圖 57，頁 362；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臺北：燕京文化，1977 年），頁 55-66。

<sup>4</sup> 圖版參見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頁 91-99；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1981-1986 年）10 冊，頁 371-373；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頓換吐魯番學會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的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 年），第 3 卷，

柒年壬寅歲十二月十二日，永安寺學仕郎高清子書記了」。這樣保留題記的卷子不在少數，可以發現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皆有，而以唐寫本居多，期間橫跨 5 個世紀。

隨著其他收藏於世界各地的敦煌寫卷陸續公開，仍可期待有新發現。如，與敦煌同屬西域地區的吐魯番，<sup>5</sup>20 世紀以來相繼出土大量文書，其中發現十數件的《孝經》殘卷。與敦煌本比較，吐魯番出土《孝經》殘卷，亦包含白文《孝經》、鄭玄《孝經注》、唐玄宗《孝經注》、《孝經解》、《孝經義》，類型相似。<sup>6</sup>另外，敦煌寫卷中還有「學郎《孝經》策論草稿」2 件，<sup>7</sup>吐魯番出土「考試時學生所答策問卷」三十餘號中，亦發現《孝經》策問卷 8 件，反映唐代西北邊陲的沙州、西州地區學生練習策答、準備明經科舉考試的情形。<sup>8</sup>2010 年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收藏新疆和田等地出土的吐魯番文書中，還有新發現「唐寫本《孝經鄭氏解·卿大夫章》」殘卷。<sup>9</sup>六朝隋唐這一段《孝經》講習極為活躍、著述亦多，<sup>10</sup>卻少有傳世資料留存。由於敦煌寫卷及吐魯番文書的發現，並且包含前所未見的文獻，

頁 1-3。

- <sup>5</sup> 榮新江先生曾提出，研究敦煌文獻：「從廣義的敦煌學來講，還應當把與敦煌文獻性質相同的吐魯番、和田、庫車、黑城等地出土的寫本文獻也考慮進來。」由此意義而言，吐魯番出土文獻亦屬於榮氏提出的「廣義的敦煌學」範疇。引文參見榮新江：〈敦煌文獻與古籍整理〉，《慶祝吳其顯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頁 269。
- <sup>6</sup> 根據學者針對吐魯番出土《孝經》的研究，筆者整理出白文《孝經》殘卷 4 件，鄭玄《孝經注》殘卷 3 件，唐玄宗《孝經注》殘片 3 件，佚名《孝經義》、《孝經解》殘卷各 1 件，合計達 12 件。參見本論〈附錄：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寫卷一覽表〉相關項目。
- <sup>7</sup> 高啟安、賈小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獻》第 11 冊非佛經文獻輯錄〉，《敦煌學輯刊》2003 年第 2 期，頁 20-21。
- <sup>8</sup> 劉波：〈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吐魯番文書唐寫本經義策殘卷之整理與研究〉，《文獻》2011 年第 3 期，頁 10-23。
- <sup>9</sup> 2010 年 6 月 11 日公佈《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推薦名單中，收錄此卷編號及題記為：「00109 孝經鄭氏解·卿大夫章〔漢〕鄭玄注唐寫本 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保護網」<http://pcab.nlc.gov.cn/gjpc/list.action?id=25885>（2014 年 5 月 21 日上網）；《光明日報》2013 年 12 月 13 日 10 版以題為〈西域文書的新發現〉，有對此作出報導。
- <sup>10</sup> 《隋書·經籍志》之〈孝經類〉列目「十八部，合六十三卷，」若加上亡佚書，達「合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引文參見〔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頁 934。

為《孝經》從輯佚校勘的文獻學研究至思想、民俗等研究，無疑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補充及新課題的開展。

針對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範疇的研究，王重民、黃文弼、蘇瑩輝、林秀一、陳鐵凡、王利器、陳金木、榮新江、任半塘、嚴耀中、柳洪亮、鄭阿財、許建平、王素、李德超、張錫厚、趙楠、劉波、金澄坤等學者，於此領域具有代表性研究成果。透過學者諸多的努力，相關敦煌吐魯番本《孝經》在針對傳世文本的輯佚校勘、綴合定名乃至綜合編目等皆有不同程度的深入與長足發展。本論是對這些研究成果的初步整理。2007年韓峰博士論文《敦煌本儒家文獻研究》設〈敦煌本《孝經》的整理研究〉一項，<sup>11</sup>針對敦煌本《孝經》研究成果作出簡明的整理，亦可茲參考。

## 一、相關敦煌本《孝經》的研究整理

相關敦煌本《孝經》的研究整理，始於20世紀30年代。在主要收藏在英、法、俄等國家圖書館的敦煌寫卷尚未公開的狀況下，1924年石濱純太郎與內藤虎次郎尋訪歐洲，針對伯希和蒐集的西域出土古文書和敦煌文獻展開調查，並且抄錄了大量的資料。回國後石濱氏發表《敦煌雜考》、《敦煌石室の遺書》等文章，<sup>12</sup>成為日本敦煌學領域的開拓者。1935年林秀一博士據石濱氏與內藤氏的抄錄筆記，撰寫發表〈補訂敦煌出土孝經鄭注〉，<sup>13</sup>1936年發表〈敦煌出土孝經義疏解說〉。<sup>14</sup>之後陸續更有補訂，校勘用寫卷包括P.3428、P.2674、P.3274、P.3378、P.3382、S.1386、S.728、P.3372、P.2545、P.2715、P.2746、P.3830（以上為石濱氏與內藤氏的抄錄筆記）、S.707、S.3824、S.3993、S.5545、S.5821、S.6165、S.6177、P.3527、

<sup>11</sup> 韓峰：《敦煌本儒家文獻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頁100-105。

<sup>12</sup> 石濱氏前論發表於《支那學》第4卷第2號（1927年3月），頁147-148；後論為大正14年（1925）8月5-8日於大阪懷德堂講演文稿，同年12月以單行本私家出版。

<sup>13</sup> 原載《書誌學》第4卷第1-5號，昭和10年（1935）1月-5月；後經修訂，以題為〈敦煌遺書孝經考〉、〈敦煌遺書孝經鄭注本の經文復原に就いて〉、〈敦煌遺書孝經鄭注復原に関する研究〉三篇收載於《孝經學論集》（東京：明治書院，1976年），頁32-108。案本論凡徵引日文論著，引文為筆者譯成中文，但論著題目保留原文，採用日文假名及當用漢字表述。

<sup>14</sup> 原載《漢學會雜誌》第4卷第1號，昭和11年（1936）3月；後經修訂，以題為〈敦煌遺書鄭注孝經復原に関する研究〉收載於《孝經學論集》，頁109-148。

P.3369, P.4628、P.4775、P.3897 合計 24 個卷號，<sup>15</sup>開日本使用敦煌寫卷輯佚《孝經》之先河。

1934 年，王重民先生接受北平圖書館的派遣，赴英法兩國蒐集資料，並於 1935 年至 1937 年在《大公報圖書副刊》、《北平圖書館圖書刊》等雜誌上陸續發表了調查期間所整理出的寫卷提要，後由北平圖書館匯集成兩輯《巴黎敦煌殘卷敘錄》（1936、1941），包括經部敘述 11 篇，涉及經籍寫卷 25 號。<sup>16</sup>其中，1937 年 10 月 30 日撰寫〈御注孝經疏·元行沖疏·伯三二七四〉一文，是民國時期第一篇針對敦煌《孝經》寫卷研究的論文。<sup>17</sup>

30 年代還有伯希和編、陸翔譯《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在《北平圖書館圖書刊》分期刊出，<sup>18</sup>其中提要介紹《孝經》寫卷 11 件。到 50 年代，在中國已公開的敦煌《孝經》寫卷有 16 件，1962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收錄英法藏 25 種，<sup>19</sup>孟列夫主編《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對俄藏《孝經》寫卷 3 件亦有提要介紹。<sup>20</sup>這樣，針對敦煌本《孝經》進行匯集整理的綜合性研究條件已經具備。

60 年代至 70 年代，陳鐵凡先生在臺灣較早針對敦煌《孝經》作出體系的整理。1977 年，由其彙編整理出 31 號綴合 29 件的敦煌本《孝經》殘卷，著成《敦煌本孝經類纂》一書出版，並於翌年發表〈敦煌本孝經考略〉一文，<sup>21</sup>針對前書所彙編 31 號綴合 29 件，逐一作出解題，並加以分類：

- 1、《孝經白文》，12 種，原 12 卷（包括：P.3369+4775、P.3830、S.5545、S.5821、M1423、P2715、S.707、P.2746、M.1424、S.6165、T.53）；
- 2、《鄭氏孝經並序》，7 卷（包括：P.4628、P.4897、P.3372、P.2524、P.3698、P.3416、S.1386）；

<sup>15</sup> 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鄭注復原に関する研究》，頁 65-108。

<sup>16</sup>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頁 23。

<sup>17</sup>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64。

<sup>18</sup> 伯希和編、陸翔譯：《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北平圖書館圖書刊》第 7 卷 6 號（1933 年 11、12 月）、第 8 卷 1 號（1934 年 2 月），又影印本收載於北京：書目出版社，1992 年。

<sup>19</sup> 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年），頁 419-420。

<sup>20</sup> 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上冊，頁 564、565；下冊，頁 450。

<sup>21</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考略〉，《東海學報》19 期（1978 年 6 月），頁 1-14。

- 3、《孝經鄭氏解》及其《義疏》，5種，原6卷（包括：P.2674+3428、M.2815、S.3993、S.3826B1、P.3274）；
- 4、《御注孝經》及其《集義》，2卷（包括 S.6019、S.3824B2）；
- 5、其他《注疏》，3種，原4卷（包括：S.6177+P.3378、P.3382、P.2757）。

藉上述整理，陳氏對敦煌本《孝經》做出概括評述，指出「敦煌所出《孝經》，什九皆鄭氏，無一古文」、「敦煌卷中《御注》僅殘存一帙」等，並最先將 S.6177 與 P.3378 綴合。<sup>22</sup>還利用敦煌本復原《鄭注孝經》全書百分之九十以上，撰著《孝經鄭氏解抉微·孝經鄭氏解斟銓》、<sup>23</sup>《孝經鄭注校證》。<sup>24</sup>這些成果，至今依然是《孝經》研究不可或缺的學術參考。

另外，1944年8月，敦煌藝術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中寺後園中的土地廟殘塑體內，發現70多件文書寫卷，其中藏有北魏寫本的《毛詩》、《孝經》（編號：敦研0366）。此卷是當時中國境內唯一見存的《孝經》寫卷。1944年至1961年，蘇瑩輝先生陸續發表〈敦煌新出寫本孝經校後記〉、<sup>25</sup>〈敦煌新出寫本毛詩孝經合考〉、<sup>26</sup>〈北魏寫本孝經殘葉補校記〉、<sup>27</sup>〈從敦煌北魏寫本論詩序真偽及孝經要義〉，<sup>28</sup>對此作出專題研究，確證此本為鄭玄《孝經注》。

伴隨80年代中法兩國所藏敦煌文獻的縮微膠卷及《敦煌寶藏》<sup>29</sup>的發行出版，以及90年代以來《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的部分）》、<sup>30</sup>《俄

<sup>22</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序》，頁1-3。

<sup>23</sup> 陳鐵凡：《孝經鄭氏解抉微·孝經鄭氏解斟銓》（臺北：燕京文化，1977年）。

<sup>24</sup> 陳鐵凡：《孝經鄭注校證》（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年）。

<sup>25</sup> 蘇瑩輝：〈敦煌新出寫本孝經校後記〉，《西北日報》（西北文化）第5期（1944年12月12日）。

<sup>26</sup> 蘇瑩輝：〈敦煌新出寫本毛詩孝經合考〉，《東方雜誌》第41卷第3號（1945年2月），頁41-53；後收載於孫彥等編：《敦煌學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頁1928-1933。

<sup>27</sup> 蘇瑩輝：〈北魏寫本孝經殘葉補校記〉，《大陸雜誌》第20卷第5期（1960年3月），頁6-11；後收載於《敦煌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頁283-295。

<sup>28</sup> 蘇瑩輝：〈從敦煌北魏寫本論詩序真偽及孝經要義〉，《孔孟學報》第1期（1961年4月），頁79-85。

<sup>29</sup>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1981-1986年）。據釋禪叡編：《敦煌寶藏遺書索引》（臺北：法鼓文化，1996年），收錄「孝經」48號、「孝經白文」8號、「孝經讚」2號，頁180。

<sup>30</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頓換吐魯番學會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的部分）》14冊，（成

藏敦煌文獻》、<sup>31</sup>《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等大型圖錄本相繼刊行，<sup>32</sup>使研究環境甚為改觀。相關敦煌本《孝經》的個案研究及綜合整理，更加深入及具備規模。

尤其針對 P.3274、P.3378、P.3382 等新發現佚名《孝經注》、《孝經義疏》的專論研究，1986 年 8 月潘重規先生〈簡論幾個敦煌寫本儒家經典〉<sup>33</sup>及 1990 年陳金木先生〈敦煌本孝經鄭氏解義疏作者問題重探〉<sup>34</sup>是繼 1937 年王重民前揭文、1948 年王利器〈敦煌本孝經義疏跋〉、<sup>35</sup>1957 年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鄭注義疏の研究〉之後的力作。還有 1976 年林秀一補訂前揭文針對 P.3274 的文本復原，以及 2008 年許建平《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4 冊〈群經類孝經之屬〉針對上述三個寫卷的錄文，<sup>36</sup>皆為重要研究參考，後述。

1991 年李德超先生〈敦煌本孝經校讐〉，利用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的彙編成果，以敦煌寫卷與宋本《古文孝經》、四庫本《古文孝經孔氏傳》進行經文全文的逐句校勘比對，指示出唐代以前古抄本與傳世的宋元以後今古文本字讀的諸多差異，為重新認識與界定《孝經》今古文，提供了一項直接參考。<sup>37</sup>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 年）。筆者統計《英藏》見存《孝經》相關寫卷圖版合計 17 號，相關細目參看本論〈附錄：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寫卷一覽表〉。<sup>31</sup>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析、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文獻》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 年）。筆者統計《俄藏》見存《孝經》相關圖版合計 9 號，相關細目參看本論〈附錄：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寫卷一覽表〉。

<sup>32</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 年）。筆者統計《法藏》見存《孝經》相關圖版合計 26 號，相關細目請參看本論〈附錄：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寫卷一覽表〉。

<sup>33</sup> 潘重規：〈簡談幾個敦煌寫本儒家經典〉，《孔孟月刊》第 24 集 12 號（1986 年 8 月），頁 3-4。

<sup>34</sup> 陳金木：〈敦煌本孝經鄭氏解義疏作者問題重探〉，《嘉義師院學報》第 4 期（1990 年 11 月），頁 147-192。

<sup>35</sup> 王利器：〈敦煌本孝經義疏跋〉，《圖書季刊》新 9 卷 3、4 合期（1948 年 12 月），頁 1-3。

<sup>36</sup> 張涌泉主編、許建平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961-2014。

<sup>37</sup> 李德超：〈敦煌本孝經校讐〉，《第二屆敦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編印發行，1991 年 6 月），頁 101-122。

榮新江先生針對敦煌寫卷以及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編目、定名、綴合、解題等，具有諸多開拓之功。《孝經》方面，1991年其在英國圖書館編制未刊敦煌殘片時，首次針對 S.9213B+A+C（《孝經鄭氏解》）、S.9956+5821（白文《孝經》）、S.10056+10060（白文《孝經》）、S.707+12911（白文《孝經》）、S.10726A+10312（《御注孝經讚》）等作出定名、解題及相關殘卷的綴合，<sup>38</sup>後收錄於《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S.6981-13624）》一書。<sup>39</sup>此書與由其主編的《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為學界提供了大量的新發現文獻的訊息，成為現今從事敦煌吐魯番相關研究必備的工具書。如，後一書中收錄有吐魯番出土的 23 件「策問殘片（包括 8 件《孝經》策問卷）」，<sup>40</sup>為研究唐代教育史及科舉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受到學者關注。

許建平先生在綜合前人研究基礎上，先後於 2006 年出版《敦煌經籍敘錄》之〈卷八·孝經〉及 2008 年出版由其主編的《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4 冊之〈群經類孝經之屬〉的部分，針對敦煌本《孝經》的考察最為體系賅博，達到一個新高峰。

在《敦煌經籍敘錄》一書，許氏於〈卷八·孝經〉將所獲伯希和編號（以 P.開頭）19 件、斯坦因編號（以 S.）15 件、俄敦編號（以 Дх.開頭）7 件合計 41 件的《孝經》寫卷加以體系地分類定名。<sup>41</sup>其分類方法是，第一，以「經注疏」體例分類定名為《孝經》、《孝經注》、《孝經疏》；第二，由於敦煌本《孝經》什九都是鄭氏經文，故將所有無注白文本歸於一類，不管是否是鄭本還是其他本；第三，以「著者別」對《孝經注》、《孝經疏》再分類；第四，對每個寫卷所涉及內容的篇目括注於後以示區別。藉此編列出如下六類及各卷定名：

第一類為白文《孝經》，針對 27 個卷號，綴合成 22 件，各卷定名為：P.2545《孝經（序—五刑）》，P.2715《孝經（三才—喪親）》，P.2746《孝經（紀孝行—喪親）》，P.3369/4775《孝經（開宗明義—喪親）》，P.3372《孝

<sup>38</sup> 榮新江：〈《敦煌漢文文獻》評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1992 年第 4 期。

<sup>39</sup> 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S.6981-13624）》（臺北：新文豐，1994 年。）

<sup>40</sup> 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950-952。

<sup>41</sup>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頁 387-429。

經(序—廣至德)》, P.3416C《孝經(序—喪親)》, P.3643p1《孝經(孝治)》, P.3698《孝經(序—喪親)》, P.3830《孝經(天子—廣要道)》, P.4628/Дx.02962《孝經(序)》, P.4897《孝經(序—開宗明義)》, S.1386《孝經(序—喪親)》, S.5545《孝經(卿大夫—三才)》, S.6165《孝經(廣要道—喪親)》, S.707+12911《孝經(聖治—喪親)》, S.728《孝經(開宗明義—喪親)》, S.9956+5821《孝經(士行孝—聖治)》, S.10056A+10060《孝經(天子—卿大夫行孝)》, Дx.00838《孝經(廣要道—喪親)》, Дx.01318《孝經(三才—聖治)》, Дx.04646《孝經(聖治)》。

第二類為鄭玄《孝經注》, 針對 9 號, 綴合成 7 件, 各卷定名為: P.2674+3428《孝經注(開宗明義—喪親)》, P.2556p《孝經注(喪親)》, S.3824V/1《孝經注(喪親)》, S.3993+9213《孝經注(五刑—諫諍)》, Дx.02784《孝經注(聖治)》, Дx.02979《孝經注(聖治)》, Дx.03867《孝經注(紀孝行、五刑)》。

第三類為唐玄宗《孝經注》, 存 1 號 1 件, 對其定名為: S.6019《孝經注(聖治)》。

第四類為佚名《孝經注》, 針對 3 號, 綴合成 2 件, 各卷定名為: S.6177+P.3378《孝經(開宗明義—三才)》, P.3382《孝經注(三才—聖治)》。

第五類為佚名《孝經鄭注義疏》, 存 1 號 1 件, 對其定名為: P.3274《孝經鄭注義疏》。

第六類為佚名《孝經疏》, 存 1 號 1 件, 對其定名為: P.2757V《孝經疏(喪親)》。

這樣的分類定名, 第一, 使各卷納入統一的體系, 同時涵蓋「編號」、「經注疏體例」、「著者」及「內容」四項要素, 使各卷之間的關聯與區別更為特徵明顯。第二, 將白文寫卷統一定名為《孝經》, 從而改進了陳鐵凡於《敦煌本孝經類纂》將「有鄭玄《孝經序》」的白文本與無序白文本分開, 將有序白文本計入鄭注《孝經》類的不恰當分類方式。<sup>42</sup>第三, 針對各卷解說之後, 均有列舉卷本「圖版、錄文」的出處及相關代表「研究」, 為研究者總體把握並易於利用, 提供了簡明切當的基礎研究, 帶有工具書的性質。

<sup>42</sup>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 頁 387。

第四，還有針對前人未定或者定名錯誤的卷本做出補訂及修正。如，將 P.4628 與 Dx.02962 綴合，並定名為《孝經序》，修正了《俄藏》對 Dx.02962 原來定名為「孔子傳」的錯誤。又如 P.3382《孝經注（三才一聖治）》，有學者認為是韋昭《孝經解讚》，許氏列舉四證以證明其說之謬，認為應以潘重規以此為《孝經》講經文為然。<sup>43</sup>

第五，另於〈存目〉收錄兩件。其一，〈土地廟遺書〉收錄「敦研 0366《孝經（感應—喪親）》」1 件。<sup>44</sup>針對此卷的歸屬學者有爭議，許氏從李正宇、池田溫認為「非藏經洞遺物」。<sup>45</sup>《敘錄》明確以藏經洞寫卷作為考察範疇，故另設〈存目〉收錄此卷，其立意在於明確此卷與「藏經洞遺物」有別，並依其出土地點歸為〈土地廟遺書〉，就此而言，許氏仍是將此卷歸入敦煌寫卷體系的。

其二，〈疑偽〉收錄「首都博物館藏本《孝經》」1 件。此卷為白文《孝經》，起〈廣要道章〉首句，至〈喪親章〉末，卷末有題記「太康四年歲在癸卯五月十六日張儁寫」1 行。<sup>46</sup>葉渡先生認為卷本「書寫工麗謹嚴」，是「傳抄嚴謹的本子」，字體風格為「西晉墨跡」，從而研判此卷為西晉寫卷。<sup>47</sup>王素先生亦親睹此卷，並廣泛引證民國以來書家針對西晉索統寫《道德經》殘卷以及張儁寫此《孝經》殘卷的鑑定，撰文支持葉氏的觀點。<sup>48</sup>但

<sup>43</sup>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頁 422-423。

<sup>44</sup> 同上註，頁 435。

<sup>45</sup> 施萍婷認為此卷是王道士隱藏在殘塑中的藏經洞遺物，參見施萍婷：〈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廟寫本源自藏經洞〉《敦煌研究》1999 年第 2 期，頁 39-46。另有學者持相反意見。參見李正宇：〈土地廟遺屬的發現、特點和入藏年代〉，《敦煌研究》1985 年第 3 期，頁 92-97；池田溫：〈一九四四年莫高窟土地廟塑像中發現文獻管見〉，收入《敦煌文叢》上冊（臺北：新文豐，1999 年），頁 1-38。

<sup>46</sup> 首都博物館編：《歷代書法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 年），頁 1-3。有收載此卷的圖版影印，題記定名為「西晉張儁寫本《孝經》殘卷」，解題云「紙本縱 27 釐米橫 89.4 釐米 這卷殘卷紙色灰暗，多處殘蝕，個別字漫滅損壞。……此卷除最後一章與前面連寫外，其餘每章另起一行，但無篇名和次序。文字與《十三經注疏》本無大出入，只有個別脫字和一些通假或異體字。……此卷款署太康四年為西晉年號，書手張儁不知何許人。這段殘卷字體俊秀古雅，隸書意味極濃郁，風格典型，意趣盎然。」

<sup>47</sup> 葉渡：〈西晉寫本《孝經》殘卷初探〉，《首都博物館十五周年論文選》（北京：地質出版社，1996 年），頁 200-207。

<sup>48</sup> 王素：〈西晉索統寫《道德經》殘卷續論——兼談西晉張儁寫《孝經》殘卷〉，《首都博物館叢刊》第 17 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年），頁 3-11。

許氏指出：第一，「寫卷所存佔《孝經》全文近三分之一的內容，而與今本（注疏本）的差異僅僅是幾個古今字、異體字的差別」；第二，「寫卷第 14 行『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句與注疏本全一樣」，「邢昺說『故治可移于官』的『故』字是唐玄宗注《孝經》時加上去的。」<sup>49</sup>由此指出此卷之偽。葉氏、王氏參酌近代書家從書法鑑定角度對卷本的肯定性評述，認為此卷之真；許氏則從文本傳承沿革加以分析，指出此卷之破綻。比較而言，文本傳承沿革的學術分析，令人感到更具說服力，且近代書家對此寫卷從書法角度亦有指其為「民國偽作」的觀點。<sup>50</sup>

在此基礎上，許氏於《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4 冊〈群經類孝經之屬〉部分，綜合參用敦煌本及傳世本，針對諸種《孝經》及經注疏做出錄文。依次為：

- 一、《孝經一卷並序》，包括鄭序及《鄭注》經文；
- 二、鄭玄《孝經注》，包括〈開宗明義—喪親〉部分的經注文；
- 三、開元本玄宗御制《孝經注》，存〈聖治章〉部分經注文；
- 四、《孝經注》，包括〈開宗明義—三才〉部分經注文；
- 五、無名氏講說《孝經注》，包括〈三才—聖治〉部分經注文；
- 六、撰者不詳《孝經鄭注義疏》，包括〈開宗明義—喪親〉部分經注疏文；
- 七、撰者不詳《孝經疏》，包括〈喪親〉部分疏文。

還有針對上述各種復原本文詳備的「校記」。<sup>51</sup>綜觀所錄之文，詳實可靠，體例清晰，汲取了林秀一、陳鐵凡等眾多前人研究成果，標誌出在此範疇的最新研究水準。

由此，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孝經》寫卷全貌與規模，大致清晰明確。許氏在上述兩書所取得成果，堪為新近相關敦煌《孝經》學研究之「集大成」。

<sup>49</sup>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頁 453-455。

<sup>50</sup> 張永強《中國書法全集·兩晉南北朝寫經寫本卷·編纂劄記》指出：「敦煌吐魯番寫經的作偽大約在民國初年就開始了。現首都博物館所藏西晉太康 4 年（283）《孝經》殘卷（卷末題記「泰康四年歲在癸卯五月十六日張儁寫」），就是這樣的偽跡之一。」引文參見華人德、張永強、毛秋瑾等編：《中國書法全集·兩晉南北朝寫經寫本卷》（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3 年），頁 1。

<sup>51</sup> 張涌泉主編、許建平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883-2016。

此外，敦煌寫卷中發現幾組歌讚《孝經》類作品及策問答卷，對研究唐代至五代《孝經》在西北地區的影響及傳習，具有重要研究價值，亦可歸入敦煌本《孝經》類的研究。

其一，見於敦煌殘卷 P.3386、P.3582、P.2633、P.3910 的《楊滿山詠孝經十八章》。徐俊先生考察明確：「五言十八首，詩題及序次均依《孝經》各章，內容為隱括《孝經》文義。……其中《聖治章第九》末二句云：『從來邦有道，不及大中年。』大中年，當即唐宣宗大中年間。宣宗在當時有『小太宗』的美譽，敦煌地區於大中初回歸唐國，對宣宗大中朝有特殊感情，可知此詩應作於宣宗大中年間。又據題記，此卷鈔寫於天福 7 年(942)，寫作年代應在此之前。由此知，《詠孝經十八章》乃是一組唐詩，作者為晚唐時人楊滿山，全詩以《孝經》章次為序，依章吟詠。」<sup>52</sup>張錫厚先生集上述 4 卷所輯錄本最全。<sup>53</sup>

其二，P.2721、P.3910、S.0289、S5780《新集孝經十八章皇帝感》，任半塘先生有校錄全文，並作出解題：「甲本（P.2721）寫珠玉抄等 3 種，繼寫《開元皇帝讚金剛經》1 卷，繼寫《新集孝經十八章》，殘存 12 首，辭屬玄宗朝作品。背面寫舜子變後有題記為『天福十五年』，實乃乾祐 2 年，公元 949 年。乙本（P.3910）前有標題『新合孝經皇帝感辭一十一首』，末又有『新合孝經一卷』6 字，惟辭僅 5 首，且短一句，並無十一首。丙丁二本（S0289，S7580）即下一套『千文皇帝感』之二本，其中有六首非括千文，乃括《孝經》，茲移補入右組，即最後之六首是也。」<sup>54</sup>

其三，P.3816、S5739、S.3824《御注孝經讚並進表》，由鄭阿財先生作出寫卷全文校錄，並研究明確，開元天寶中，「經過積極提倡，《孝經》一書遂成為家家必備，人人必讀的經典，而玄宗頒行的《御注孝經》尤為全國上下所稱道」，「《御注孝經讚》作者蓋因唐玄宗《御注孝經》的完成而作讚以為頌揚，同時作者請求同州縣例，於天下諸郡及都護府置《孝經》為官學，以訓導將士子弟」，「《御注孝經讚》作者為唐開元天寶年間，曾為安西都護的張嵩、張孝嵩。」<sup>55</sup>

<sup>52</sup>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253-263。

<sup>53</sup> 張錫厚：〈敦煌本《詠孝經十八章》補校〉，《敦煌研究》2005 年第 2 期，頁 88-91。

<sup>54</sup>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734-743。

<sup>55</sup> 鄭阿財：〈敦煌寫卷「御注孝經讚並進表」初探〉，《敦煌學》第 18 期（1992 年 5 月），頁 107-115。

其四，Dx.03895+Dx.03901《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論》，此殘卷為兩卷綴合，存 21 行。起行及第 9 行分別有策題「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論」，2 行至 15 行是先後針對〈紀孝行章〉、〈廣揚名章〉、〈天子章〉、〈開宗明義章〉的相關內容進行的策論。16 行至 21 行為另一篇策題為「立仁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論」的策論，文中多處反覆塗改及添字，還有施加句讀。高啟安、買小英先生合著論文及金澐坤先生論文皆有對此卷的錄文校釋，前論指出此卷蓋為五代以後「學郎策論草稿」，<sup>56</sup>金論認為此卷為「黑水城文書的可能非常大」、「是西夏準備應舉的舉子練習試論的草稿」，但並未有效排除此卷為「藏經洞文書」。<sup>57</sup>崔峰先生從敦煌儒佛兼容的視角，指出此卷有「寺學」習作的背景；<sup>58</sup>楊明璋先生從敦煌文學著重實用的特徵，將此卷與 Dx19015〈問周鄭交質其失孰甚試明言之〉三篇文章進行比對，指出「文章塗改甚多，應該是作者書寫時的草稿，目的顯然是為科舉考試『貼經』一項的練筆試作」，<sup>59</sup>則是較為契合此卷書寫背景的考察。

至此，敦煌出土《孝經》相關的寫卷，許建平整理敦煌藏經洞寫卷計 41 號、敦煌研究院出土 1 號、歌詠、頌讚《孝經》類寫卷 10 號、學郎策論草稿 2 號，合計達 54 個卷號。

唐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文教政策，十分注重對《孝經》的研習與推廣。據《唐六典》記載：「明經各試所習業，文注精熟，辨明義理，然後為通。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谷梁》為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

<sup>56</sup> 高啟安、買小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獻》第 11 冊非佛經文獻輯錄〉，頁 20-21。

<sup>57</sup> 金澐坤：〈《俄藏敦煌文獻》中的西夏科舉「論」稿考——兼論唐宋西夏的科舉試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4 號（2010 年 3 月），頁 101、108。金論針對唐宋科舉制度沿革做出細密考查，主要在於論證唐末五代科舉試論之不興。然而由此無法排除唐末五代科舉全無試論，更不能由此將 Dx.03895+Dx.03901 殘卷孤立排除於唐末五代。另外，從元代科舉不興「以論試士」定前述殘卷為西夏文書，輔助此說，以「《孝經》在西夏科舉考試中非常重要，並且很常見」，就此指出本卷為「黑水城文書」，以及相關卷本紙質、書法等討論，皆為間接的背景性考察，大都不能構成直接論據。由此，筆者仍然傾向多數論者指出此卷為唐末五代學郎策問練習草稿的觀點。

<sup>58</sup> 崔峰：〈晚唐五代宋初地區儒佛兼容的社會文化〉，《敦煌學輯刊》2009 年第 3 期，頁 27。

<sup>59</sup> 楊明璋：《敦煌文學中之諧隱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年），頁 57。

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其《孝經》、《論語》並須兼習。」<sup>60</sup>這是指科舉明經取士，生員任選九經作為選修課目同時，必須兼修《孝經》和《論語》。另有設童子科，據《唐會要》記載：「童子舉人取十歲以下者，習一經兼《論語》、《孝經》，每卷誦文十科，全通者與出身。」<sup>61</sup>這些皆表明經由科舉仕途推廣《孝經》、培養官僚預備人員的政策。又《唐會要》云：「（天寶三載）十二月，敕：自今已後，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教習，學校之中，倍加傳授，州縣官長，明申勸課焉。」<sup>62</sup>這是地方學校與官府在庶民百姓階層合力推廣《孝經》的政策。敦煌寫卷儒家類經籍中，《論語》、《孝經》數量最多，一定程度體現出這樣的「舉孝勸孝」文教政策的成效。陳鐵凡先生指出「敦煌本《論語》、《孝經》，頗多為學童默寫課卷」，<sup>63</sup>亦可了解這些《孝經》寫卷的性質與用途。

## 二、相關吐魯番出土《孝經》的研究整理

伴隨上世紀初以來敦煌寫卷的發現，吐魯番地區的石窟、寺院遺址及古墓中亦陸續出土大量的文書殘片。其中，漢文文書二千七百多件，相關《孝經》的殘卷或殘片，已由學者研究整理出十餘件。

黃文弼先生對吐魯番文書的早期發掘，貢獻卓越。在其 1956 年出版的《吐魯番考古記》一書，全面介紹了 1928 年至 1930 年兩次在新疆吐魯番地區進行考察的過程及針對所發覺遺物的圖文介紹，其中兩篇相關吐魯番出土《孝經·三才章》及《孝經·開宗明義章》殘紙的介紹，是最早相關吐魯番出土《孝經》專論研究。<sup>64</sup>

自 1959 年至 1975 年，新疆博物館文物考古隊以吐魯番之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兩墓葬區為重點，進行十餘次大規模發掘和清理，掘得近萬片漢文文書。1975 年，中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博物館和武漢大學

<sup>60</sup>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 2〈尚書吏部〉，頁 45。

<sup>61</sup> 〔宋〕王溥撰：《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卷 76〈貢舉中〉，頁 1399。

<sup>62</sup> 同上註，卷 35〈經籍〉，頁 645。

<sup>63</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考略〉，頁 2。

<sup>64</sup> 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考古學特刊》第 3 號，（北京：中國科學院，1954 年），頁 20-22。

歷史系組成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小組，由唐長孺先生主持整理，拼得文書近 1800 件，編印成《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全 10 冊，1981 年至 1991 年由文物出版社陸續出版。之後於 1992 年至 1996 年，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對照本)全 4 冊。2005 年，陳國燦、劉安志先生主編的《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及 2007 年榮新江先生主編的《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相繼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針對收藏於英、法、美、俄、德、日等國家的吐魯番文書，作出全面的存目整理。這樣，相關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資料蒐集，大致齊備。

筆者初步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收錄吐魯番《孝經》殘片錄文計有 2 件，編號及定名分別為：「72TAM169:26(a) 古寫本《孝經》」、「60TAM313:07/3 義熙元年辛卯抄本《孝經解》殘卷」。《文書》(圖文對照本)除收錄此兩卷的圖版及錄文之外，<sup>65</sup>增補 2 件：「72TAM169:84 文書殘片」(王素先生為之定名為「高昌《孝經》」)、<sup>66</sup>「66TAM67:15/1, 15/2 古寫本《孝經》殘卷(一)(二)」的圖版及錄文。<sup>67</sup>《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編目《大谷文書》收藏吐魯番《孝經》殘片計有 2 件：「3279v 《御注孝經》(?) 殘片」、<sup>68</sup>「5417(A)《孝經注》殘片」。<sup>69</sup>《總目(歐美收藏卷)》編目《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出土文獻》收錄 1 件：「Ch2547r 《御注孝經疏·五刑章》」。<sup>70</sup>

<sup>65</sup>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第 2 冊，頁 268-273、354。

<sup>66</sup> 王素：〈《吐魯番出土文書》〔壹〕附錄殘片考釋〉，《出土文獻研究》第 3 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45-169。

<sup>67</sup>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錄本)第 1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頁 230-232；第 1 冊，頁 290；第 2 冊，頁 354；第 1 冊，頁 236；第 3 冊，頁 444-445。

<sup>68</sup> 《總目》解題云：前、後、上、下殘，存 4 行，3 行記有「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參見陳國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58。

<sup>69</sup> 《總目》解題云：7.3×6.0，前、後、上、下殘，存 2 行，1 行「而日見之」下有雙行小字「言□□之」。同前書，頁 353。

<sup>70</sup> 《總目》解題云：「10.4×11.3cm，3 行，楷書不精，大字正文，雙行小注。文字相當於《五刑章》部分殘文，與今文相較，注文略有不同。吐峪溝遺址出土。」參見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頁 209。

2005年許建平發表〈跋大谷文書中四件未經定名的儒家經籍殘片〉一文，是少數針對吐魯番出土文書《孝經》殘片作出較為體系整理的研究，茲錄其整理內容如下：

1、白文本：

- (1) 《開宗明義》章殘片，<sup>71</sup>1928年黃文弼發現於吐魯番哈拉和卓舊城。
- (2) 存《諸侯》至《孝治》六章的內容，<sup>72</sup>1968年出土於交河故城遺址。
- (3) 存《開宗明義》至《孝治》九章的內容，<sup>73</sup>1972年出土於阿斯塔那67號墓，編號為72TAM169：26(a)。

2、鄭注本：

- (1) 《三才》章殘片，<sup>74</sup>1928年黃文弼發現於吐魯番哈拉和卓舊城。
- (2) 存《感應》、《事君》及《喪親》章的內容，<sup>75</sup>1966年出土於阿斯塔那67號墓，編號為66TAM67：15/1，15/2。<sup>76</sup>

包括許氏於同論文針對《大谷文書集成》收錄編號5417(A)作出解題並定名為「唐玄宗御撰《孝經注》」，<sup>77</sup>則許氏統計出：白文本《孝經》3件；鄭玄本《孝經注》2件；唐玄宗《御注孝經》1件。對至今尚未收入各種大型圖錄及編目的黃文弼1928年發現2件及柳洪亮論文圖文介紹1968年出土1件皆有論及，針對各卷的解題，亦清晰展現出上世紀吐魯番《孝經》出土的歷程。

<sup>71</sup> 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圖板2之圖4（摹本），頁20。

<sup>72</sup> 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圖版）頁470，（錄文）頁118-120。

<sup>73</sup>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錄本）第1冊，頁230-232；《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第2冊，頁268-273。

<sup>74</sup> 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圖板2之圖3（摹本），頁20。

<sup>75</sup> 圖版：《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錄本）第3冊，頁444-445；《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第7冊，頁307-308。

<sup>76</sup> 許建平：〈跋大谷文書中四件未經定名的儒家經籍殘片〉，《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4期，頁11。

<sup>77</sup> 許建平云，「據《集成》言，本件殘片出自交河故城，乃是野村榮三郎與橋瑞超於1908年11月19日至22日在交河故城發掘所得。」參見許建平前揭文，頁11。

許氏的整理，尚可增補。結合筆者前文整理，第一，《文書》（圖文本）收錄「72TAM169：84 文書殘片」，王素先生定名為「高昌《孝經》」，屬白文寫卷，可補許氏前文統計，則吐魯番出土白文《孝經》合計有 4 件。

第二，《大谷文書》「3279v《御注孝經》(?) 殘片」，注記有「明王孝治以致和平」，按《邢疏》云「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蓋襲《元行沖疏》，《大谷文書》為此卷定名《御注孝經》亦有據；又，《總目（歐美收藏卷）》收錄「Ch2547r《御注孝經疏·五刑章》」殘片 1 件，亦可補許氏前文統計。這樣，吐魯番文書中已發現唐玄宗《御注孝經》計 3 件。

第三，2010 年 6 月 11 日中國國務院公佈《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推薦名單中收錄 1 卷，編號及題記為：「00109 孝經鄭氏解·卿大夫章（漢）鄭玄注唐寫本國家圖書館」（內容尚未公開），則鄭玄《孝經注》達到 3 件。

第四，關於 60TAM313：07/3 殘片，王素定名為「高昌抄本《孝經解》」。按，此殘片存 5 行，首行存「孝經解」3 字，次行存朱書「釋比丘戒妙孝經一」8 字，三行存「孔子於魯襄公廿二年十一」11 字，四行存「公十六年夏四月卒於乙丑」11 字，五行存「畢命七十右二」6 字，後為雙行注文，存「義熙元年辛卯抄口一口正口」等字樣。按此卷記孔子生卒年採《史記》說，為傳世及其他出土諸本所未見，蓋釋家疏解，為首次發現。

第五，1997 年吐魯番地區洋海 1 號古墓中出土《孝經》殘片，編號為 97TSYM1：12p，此殘卷正面抄寫《論語·堯曰》「利而利之……猶之以人也」正文及注文，存 9 行；背面抄寫《孝經義》，存 10 行，首行「孝經義」3 字，自二行「孔子魯人……」至十行「世俗皆云仲尼（後缺）」為一序文，較敦煌諸本《鄭序》旨同而文約。朱玉麒先生以為此序行文避免了「文辭卑弱，義理乖違」的表現，是與敦煌本《鄭序》同樣，皆有祖述《鄭注》的傳統。<sup>78</sup>此卷《孝經義》序文，與出土諸本不同，亦為首次發現。

第六，《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編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館藏吐魯番文獻》收錄 23 件「策問卷」殘片，《文書》對此解題云：「按，1a、1b、3a、7a、7b、7c、7d、7e、7f、7g、7h、7i、7k-1、7k-2、7l、7m、7n、7o、7q、7r、7s 均屬於同一組文書，為唐西州學生考

<sup>78</sup> 朱玉麒：〈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0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67-173；《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研究論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58-173。

試時學生所答策問卷，後有老師批語。今剪作鞋樣，故分別編目。」<sup>79</sup>其中，編號 Peald7a、7d、7k (2)、7m、7o、7r, Peald11a、11d 殘片 8 件，為「《孝經》策問卷」，皆為《鄭注》。劉波先生考察指出，這些「策問卷」或者可能只是習作試卷，反映出當時西北邊陲的沙洲、西州等地，學生與士子揣摩練習對策，準備進士明經科舉考試的情形。

而且，這批文書均有被剪裁的痕跡，是被當成廢紙製成的紙鞋等冥器，屬出土的墓葬品。<sup>80</sup>吐魯番出土文書大多發掘於墓葬，多有被製成葬具（紙鞋）而埋入墓中，如黃文弼發掘的 2 件《孝經》殘紙亦如此。

但發掘於墓葬的《孝經》，還可見與上述被當成廢紙製成冥器正相反的形態，即鄭重以文書形態帶入墓室的隨葬品。嚴耀中先生考察明確，72TAM169:26 (a)、60TMA313:07/3 殘片是作為隨葬品，見於麴氏高昌貴族墓葬的「衣物疏」內。並指出吐魯番出土的麴氏高昌（501-640）時期隨葬「衣物疏」中所列物品裡，往往有《孝經》一卷，這也是疏中唯一提到一種書籍。反映出在這一時期，《孝經》曾被作為用孝道維繫大家族秩序的重要經典，在貴族階層深具影響，乃至還被作為禳惡勝邪、保佑靈魂平安的神書，具有崇高的地位。<sup>81</sup>吐魯番出土《孝經》這些獨具的特徵，與敦煌寫卷《孝經》多為學郎、考生抄寫習作之用，有明顯的區別。

這樣，以上已經發現吐魯番出土《孝經》殘片有，白文《孝經》4 件、鄭玄《孝經注》3 件、唐玄宗《孝經注》3 件、《孝經解》1 件、《孝經義》1 件，《孝經》策問卷 8 件，合計已達 20 件。

### 三、敦煌吐魯番《孝經》發現之前今古本的沿革

《孝經》作為倡導封建君主孝治的儒家典籍，受到漢代以降歷代統治者的青睞。《後漢書·荀爽傳》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sup>82</sup>則最為簡明道出了《孝經》在漢代的普及政治功能。後漢兩晉《孝經》甚至被奉為神書，乃至歷朝歷代的皇帝注解《孝經》等，都是對《孝

<sup>79</sup> 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頁 950-952。

<sup>80</sup> 劉波：〈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吐魯番文書唐寫本經義策殘卷之整理與研究〉，頁 10-23。

<sup>81</sup> 嚴耀中：〈麴氏高昌時期的《孝經》與孝的觀念〉，《中華文史論叢》第 38 輯（1986 年 6 月），頁 275-282。

<sup>82</sup>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頁 2051。

經》「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教化功能的再三確認。《孝經》同時廣泛傳播社會各階層，對中國傳統孝道的推行影響深遠。雖然其本出自不甚明瞭，<sup>83</sup>但在前漢文帝時既已先於五經，一度被置於學官。<sup>84</sup>當時主要通行十八章和二十二章的二種本，十八章本為朝廷博士官用隸書所寫稱作《今文孝經》，二十二章本出自孔壁為古文文字本稱作《古文孝經》。據說孔安國為之作《傳》，獻上武帝朝廷卻未能見用於官學。劉向整理折中今古文《孝經》並定為十八章，後漢鄭眾、馬融等經學大師曾為劉向本作注，皆已失傳。通行魏晉南北朝官學用本唯有《孝經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注，或有疑之者。《孔傳》亦於梁代一度設立於官學，旋即亡佚梁亂。至隋，秘書監王劼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劉炫，劉炫為之述議，講於民間，漸聞朝廷，遂置學官，然當時儒者多疑炫之偽作。<sup>85</sup>

<sup>83</sup> 關於《孝經》的作者問題，古今說法不一，有孔子作（班固說）、曾子作（司馬遷說）、曾子後學作（朱熹說）、孔子後學七十子作（司馬光說）、子思作（王應麟說）、孟子門徒作（王正己說）、漢儒偽作（姚際恒說）等不同說法。另有筆者所主張秦儒作說，參見莊兵：〈《孝經》の成立を巡っ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4集（2002年10月），頁1-15。

<sup>84</sup> 後漢趙岐《孟子題辭》云：「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也記載「至孝文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與趙岐所言相合。這證明「孝經博士」於「五經博士」之先設立於文帝朝廷。但武帝時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王國維《漢魏博士考》云：「案傳記博士之罷、錢氏大听以為即在置五經博士時，其說蓋信然。……漢時但有受《論語》、《孝經》、小學而不受一經者，無受一經而不先受《論語》、《孝經》者。……漢時《論語》《孝經》之傳，實廣於五經，不以博士之廢置為盛衰也。」由此明確，雖然武帝時取消了「孝經博士」，但並不意味《孝經》的傳授由此而中斷，而是《孝經》更為普及的明證。引文參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4（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sup>85</sup> 《隋書·經籍志》記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之傳。……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余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劼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由此記載來看，梁隋之際為爭置學官主導地位，力主《鄭注》與力主《孔傳》的雙方朝臣，已然彼此指斥對方偽作而展開爭執。引文參照〔唐〕魏徵等撰，《隋書》，頁935。另外，有關《孔傳》偽作者，清人盛大士《孝經徵文敘》云：「近汪氏翼滄所得日本《古文孝經孔傳》一卷。安國作傳漢人不言，獨《家語》言之，《家語》為王肅偽撰，而安國之注《孝經》有與《家語》暗合者，隋《志》所載王肅《孝經解》久佚，今見邢昺《疏》中，多與《孔傳》同，是必王肅妄作，假托孔氏，以與己之臆見相證。」由此指出《孔傳》的偽作者是王肅。引文見丁晏《孝經徵文》

開元 7 年（719）3 月 1 日，玄宗詔令儒官質定「令明經者習讀」的科舉用經籍，《孔傳》與《鄭注》亦在質定優劣之列，然而並未達成共識而兩注依舊並用。至開元 10 年（722）6 月 2 日，玄宗以十八章今文本為底本，參酌古文及漢晉舊注，自製《御注孝經》一卷，並命元行沖作《疏》三卷，頒行國子學及天下。相隔 22 年後的天寶 2 年（743），玄宗修訂「始注」以成天寶「重注」，亦頒行國子學，同 3 年詔令天下各家收藏《孝經》一本。天寶 4 年（745），玄宗以八分書御書「重注」上石，建碑於長安大學前，即「石臺孝經」的建立。翌年更令補訂元行沖《疏》令集賢院抄寫副本頒行中外。<sup>86</sup>

《御注》確立為官學經籍以後，《孔傳》、《鄭注》遂廢於唐土，終亡佚於五代戰亂。開元「始注」亦不知何時失傳，獨天寶「重注」流傳後世，為唐代以後各朝官學所沿用。然而，開元「始注」在唐土失傳卻見存日本，現存最古的「始注」為日本室町時代享祿 4 年（1531）三條西實隆手書寫本，寬政 12 年（1800）屋代弘賢覆刻此本，現存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清家文庫」。<sup>87</sup>明治 17 年（1884），弘賢覆刻本回傳中國，收入黎庶昌編《古逸叢書》，題為《覆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sup>88</sup>

天寶「重注」至北宋真宗咸平 2 年（999），邢昺奉敕命以「重注」為底本，改訂元行沖的《疏》撰《孝經正義》3 卷。今日所見本是把「重注」的《御注孝經》1 卷與《正義》3 卷合併，卷首增邢昺「孝經注疏序」和「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的「序」而成，亦即《四庫全書》所收《孝經

（見《續皇清經解》847）。然而，《孔傳》研究史上，無論指斥劉炫偽作還是指斥王肅偽作的諸說，實際上多失考證。林秀一博士依據日本古傳劉炫《孝經述議》的研究，指出《述議》「達十二條之多並未祖述《孔傳》而是指出《孔傳》違背經旨」，從而明確劉炫為《孔傳》的校訂者而非偽作者。參見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東京：文求堂書店，1953 年），頁 47。另外，陳鴻森先生於《〈孝經〉孔傳與王肅注考證》一文，亦利用包括《孝經述議》以及敦煌寫卷等諸多文獻輯佚出王肅《孝經注》32 條，並明確《孔傳》乃是東晉時人的偽作，且多有參酌王肅《孝經注》。參見陳鴻森：《〈孝經〉孔傳與王肅注考證》，《文史》2010 年 4 輯，頁 5-32。

<sup>86</sup> 本論有關開元 7 年至天寶 4 年《御注》成立過程的記述，參照〔宋〕王溥撰：《論經義》，《唐會要》卷 77，頁 1405-1411；及同書卷 36《修撰》，頁 658。

<sup>87</sup> 參照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清家文庫目錄》，<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seike/index.html>，（2013 年 4 月 20 日上網）。

<sup>88</sup> 收於〔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之五，據光緒 10 年（1884）黎庶昌於日本東京使署刊本。

注疏》9卷。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中亦收錄邢疏本，並為之增作〈按勘記〉附於各卷末，成為後世流通最廣之善本。元行沖《疏》失傳於宋代以後，邢昺的《正義》大致承襲了《元疏》。<sup>89</sup>

《孔傳》、《鄭注》亡佚於五代戰亂，北宋太平興國9年（984），日僧裔然一度來獻《鄭注孝經》。<sup>90</sup>然藏於祕府，世罕有傳。乾道中（1165-1173），秘書郎熊克（1132-1204，字子復），曾從袁樞（1131-1205，字機仲）獲得此本，並刻於京口學宮，然而之後亦下落不明。<sup>91</sup>《古文孝經》至北宋僅存經文，司馬光為之作《古文孝經指解》1卷，范祖禹作《古文孝經說》1卷，四庫本皆有收錄。1945年馬衡先生於四川大足發現范氏《古文孝經》摩崖石刻，撰〈宋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石刻校釋〉，以《古文孝經說》之四庫本和《通志堂經解》本校之，詳加考辨，並錄有釋文。<sup>92</sup>此為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古文孝經》石刻。至南宋朱熹分《古文孝經》為經1章，傳14章，撰《孝經刊誤》1卷，元代吳澄仿《刊誤》體例分《今文孝經》為經傳撰《孝經定本》1卷。兩本明清以降產生影響，乃至遠播朝鮮日本。

及至清代輯佚學興盛，作為漢學大宗的鄭玄之著述，但殘存於古籍者，不論隻言片語盡皆被蒐集無遺。余蕭客《古經解鈎沉》，王謨《漢魏遺書抄》，黃奭《漢學堂叢書》，袁鈞《鄭氏佚書》等皆輯錄有《鄭氏注》，另有陳鱣、孔廣森、嚴可均、洪頤煊、臧庸、孫季咸、龔道耕、潘任、曹元弼等10家專門輯錄《鄭注》。同時期日本岡田挺之等亦自《群書治要》輯佚出《鄭注》，傳回清國，為嚴可均、洪頤煊等看重。然而仍僅得過半的分量。《孔傳》在日本自古多有抄本傳承，如，仁治2年抄寫本、愛知縣猿投神社藏本，建久6年（1195）抄寫、兵庫縣武田長兵衛氏藏本，仁治2年（1241）抄寫、京都大原三千院所藏建治3年（1277）等古抄本。由太宰治自日本

<sup>89</sup> 此據林秀一說。參照林秀一：〈邢昺の孝經注疏校定に就いて〉，收於《孝經學論集》，頁178-183。

<sup>90</sup> 《宋史·日本傳》記載：「雍熙元年（984），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其國多有中國典籍，裔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孝經》即鄭氏注者。」引文參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4135。

<sup>91</sup> 〔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9-70。

<sup>92</sup> 馬衡：〈宋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石刻校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分冊（1948年6月）。

古傳抄本校刊出一本傳回清國，乾隆年間收入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使清季學者得以重睹兩書。<sup>93</sup>

至此，相關《孝經》諸本的輯佚研究，在中日雙方的努力下，進展超過以往，同時亦顯現出資料方面的極限。

#### 四、敦煌吐魯番寫本對《孝經》研究的推展

##### （一）《鄭注孝經》

自敦煌《孝經》寫卷陸續被發現整理，在針對傳世文本的輯佚校勘，最有進展的是《鄭注孝經》。亡佚於五代直至清代不見傳本，經過清儒潘任、嚴可均以及日本岡田挺之等學者的努力，輯佚出《鄭注》的部分內容，然而依然只是過半程度。敦煌本的發現，為此帶來樂觀的前景。

20 世紀 30 年代，林秀一針對《孝經鄭注》的輯佚整理成就顯著，其據石濱氏與內藤氏的抄錄筆記，相繼撰寫發表〈補訂敦煌出土孝經鄭注〉、<sup>94</sup>〈敦煌出土孝經義疏解說〉之後，又撰〈敦煌遺書孝經考〉、<sup>95</sup>〈敦煌遺書孝經鄭注義疏研究〉，<sup>96</sup>持續針對所輯《鄭注》加以補訂。不僅全文復原出《鄭注》的《序》及《經》文，亦得以復原出《注》文「十中之八、九，」<sup>97</sup>最先復原出 P.3274 佚名的《鄭注義疏》，並指出「玄宗的《御注》成立以後至 200 年後的五代，西北邊陲僻遠的沙州敦煌郡地區，依然使用六朝以來的《鄭注》本，反而在敦煌遺書中《御注》使用的形迹稀少，是《孝經》傳承歷史上一個值得令人關注的現象。」<sup>98</sup>不過由於當初石濱手抄存在誤寫，林氏據其所輯佚產生的錯誤，後來得到陳鐵凡的修正。

<sup>93</sup> 參顧永新：〈日本傳本《古文孝經》回傳中國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2 期（2004 年 3 月），及〈《孝經鄭注》回傳中國考〉，《文獻季刊》2007 年第 3 期。

<sup>94</sup> 原載《書誌學》第 4 卷第 1-5 號，昭和 10 年（1935）1 月-5 月；後經修訂，以題為〈敦煌遺書孝經考〉、〈敦煌遺書孝經鄭注本の經文復原に就いて〉、〈敦煌遺書孝經鄭注復原に関する研究〉三篇收載於《孝經學論集》，頁 32-108。

<sup>95</sup> 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考〉，《孝經學論集》，頁 32-48。據著者注記，此文於昭和 23 年（1948）3 月脫稿。

<sup>96</sup> 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鄭注義疏研究〉，原載《漢學會雜誌》第 4 卷第 1 號（1956 年 8 月）；又收錄於《孝經學論集》，頁 109-148。

<sup>97</sup> 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鄭注復原に関する研究〉，頁 86。

<sup>98</sup> 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考〉，頁 48。

至上世紀 70 年代，陳鐵凡先生利用敦煌本輯佚《鄭注》取得更大進展。除前述其將敦煌各本《孝經》殘卷輯成《敦煌本孝經類纂》一書之外，又撰著《孝經鄭氏解抉微·孝經鄭氏解斟詮》、<sup>99</sup>《孝經鄭注校證》，<sup>100</sup>而以後一書多有彌補《群書治要》、《經典釋文》、《孝經注疏》等傳世文獻所沒有的《鄭注》資料，輯佚最為駭博。林氏指出：「寫本注文與舊輯本什九相同，而數量又增千餘字」、「注文所得約為全書百分之九十以上」、「敦煌遺書本與《治要》本和其他輯本，只有詳略之別，而無矛盾悖離之異。」從而推定：「此書注文實與鄭注他書符合，其為康成自著無疑。陸澄妄詆，諸儒訾嗽，俱不必論。」<sup>101</sup>至此，《鄭注孝經》不僅其原貌得到幾近完整的恢復，而且《鄭注》作者問題也得到肯定性回答。

許建平先生校定《孝經一卷並序》及鄭玄《孝經注》，全面汲取借鑑了林秀一及陳鐵凡的成果。尤其是林秀一成果，由於林氏的錄文乃據石濱氏的摹本，今所見底卷影本更有殘損，非復石濱氏所見之舊，故據林氏輯錄才得以補入。<sup>102</sup>伴隨新出土文獻的相繼公開，期待《鄭注》的輯佚補足更有進展。

另外，敦煌本《孝經》可見 7 件存鄭氏《孝經序》，針對《孝經序》的版本問題，林秀一先生指出雖然仍是取「孔子自作說」，但又稱「弟子錄之」、「採用讖緯說」、「遂開啟了宋代以後所見曾子弟子作說」。<sup>103</sup>陳鐵凡先生針對《孝經序》全文從稱謂、名物、徵引故事、釋義、文辭、語法六個方面作出全面考證，指出「漢代經學門戶森嚴，此序作者則不分畛域，雜揉古今」、「序文采及《家語》，或為王門餘緒」、「文辭卑弱，義理乖違，作者的學殖似欠深厚」，從而推論「此作者之時代不能早於西晉以前」，作者不可能是鄭玄。<sup>104</sup>

但 1997 年吐魯番洋海 1 號墓葬出土編號為 97TSYM1:12p 的《孝經義序》殘片，為鄭氏《孝經序》研究，帶來新的進展。朱玉麒先生以為此序關於《孝經》的作者問題「從觀點到表達方式都是完全一致，」而《孝

<sup>99</sup> 陳鐵凡：《孝經鄭氏解抉微·孝經鄭氏解斟詮》（臺北：燕京文化，1977 年）。

<sup>100</sup> 陳鐵凡：《孝經鄭注校證》（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 年）。

<sup>101</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序》，頁 1-3。

<sup>102</sup> 張涌泉主編、許建平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4 冊，頁 1926。

<sup>103</sup> 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考》，頁 42。

<sup>104</sup> 陳鐵凡：《敦煌本鄭氏孝經序作者稽疑》，《敦煌學》第 4 輯（1979 年），頁 9。

經義》序「在行文上對鄭氏《孝經序》作了刪繁就簡的處理，一些被研究者指為『文辭卑弱，義理乖違』的表現如稱謂、名物、徵引、釋義、文辭、語法的問題，在《孝經義》序中都得到了避免。在認可敦煌本鄭氏《孝經序》就是魏晉以來流傳的《鄭注》序言的前提下，我們應該可以將這種關係表述為：與典籍所述魏晉南北朝《孝經》義疏祖述鄭氏注《孝經》一樣，寫本《孝經義》確實證實了宗尚鄭氏傳統的存在。」<sup>105</sup>朱氏由認同《孝經義序》祖述鄭玄，連帶認同敦煌本鄭氏《孝經序》即為《鄭注》序文。由此，針對鄭氏《孝經序》的研究，呈現出不同觀點，為更為深入考察提供了線索。

## （二）《古文孝經》

《古文孝經孔氏傳》與《鄭注》作為梁隋至唐開元年間的官學用本，相對於《鄭注》的廣泛流傳，《孔傳》卻不見一本於敦煌吐魯番諸種《孝經》寫卷，頗為不可思議。不過，朱玉麒先生針對 97TSYM1:12p《孝經義》研究特別指出一點，《孝經義》引用的《孝經》原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而向來只有《孔傳》本作「訓」字，並注：「訓，教也」，與今文、宋本古文及《孝經刊誤》皆作「順」相異。《孝經義》的發現，不僅為僅為孤證的《孔傳》作偶，同時也立證了魏晉南北朝之際《孝經》「宗孔而不廢鄭」的義疏特點。<sup>106</sup>

今日見存《古文孝經》本最早只能追溯到北宋，日本發現劉炫《孝經述議》一定程度保留了隋唐《古文孝經》的面貌。敦煌吐魯番本《孝經》中雖然不見一本《古文孝經》，但如前述所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本《孝經》中，不乏留有《古文孝經》痕跡者，如，林秀一指出 P.3382「故至天子以下至于庶人」，與古文本的經文一致，今文作「故至天子至于庶人」，<sup>107</sup>李德超先生對此亦有校勘明示。其它，李氏還指出：今文〈開宗明義章〉「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P.2545、3369、3372、3416、3698、S.1386 兩句俱無「也」字（無「也」者，其它另有 24 處），如古文；今文〈孝治章〉「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P.3369、P.3382、P.3416、P.2614+3428 俱作「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與古文同；「祭則鬼享之」，S.728 作「祭則思享

<sup>105</sup> 朱玉麒：〈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頁 158。

<sup>106</sup> 同上註，頁 170。

<sup>107</sup> 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考〉，頁 38。

之」，如古文；「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P3369、3830、S.728 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俱如古文；今文〈聖治章〉「雖得之，君子不貴也」，P3398、S728、1368、P2674+3428 俱作「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如古文。<sup>108</sup>

筆者曾針對北魏「和平二年（461）十一月六日唐豐國寫孝經」殘卷、即許建平定名為敦研 0366《孝經（感應—喪親）》，與〈御注本〉、<sup>109</sup>〈指解本〉、<sup>110</sup>〈太宰本〉、<sup>111</sup>〈享保本〉<sup>112</sup>作過校勘，<sup>113</sup>結果發現〈唐豐國本〉的字讀與前列四種本皆有相異，就句末助字的「也」字為省掉最多，符合北朝時期的書風。<sup>114</sup>除俗字別字以外，實質性的異文可見以下四處：

- 1、（前缺）兄，必有長（〈御注本〉、〈指解本〉作「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太宰本〉、〈享保本〉作「言有兄也、必有長也」）；
- 2、自東自西（〈御注本〉、〈指解本〉作「自西自東」）；
- 3、忠（〈御注本〉、〈指解本〉作「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 4、孝子之事（〈御注本〉、〈指解本〉多「親」）眾（〈御注本〉、〈指解本〉、〈太宰本〉、〈享保本〉皆作「終」，別字）矣。

即〈唐豐國本〉的這四處字讀與〈御注本〉、〈指解本〉等中國傳本相異，而與〈太宰本〉、〈享保本〉等日本古文諸本相同。由此可以看出，南北朝至隋唐的今文（〈唐豐國本〉）古文（日本傳本〈太宰本〉、〈享保本〉），比唐代以後的今文（〈御注本〉）古文（〈指解本〉）差異要更小，同樣立證了魏晉南北朝之際《孝經》「宗孔而不廢鄭」的特點。

<sup>108</sup> 李德超：《敦煌本孝經校讐》，《第二屆敦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101-122。

<sup>109</sup> 〔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

<sup>110</sup> 〔宋〕司馬光撰，〔宋〕范祖禹說：《古文孝經指解》，收載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18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sup>111</sup> 〔漢〕孔安國撰，太宰純音：《古文孝經孔氏傳》，《知不足齋叢書》乾隆 41 年據享保 17 年刊本。

<sup>112</sup> 〔漢〕孔安國撰：《古文孝經孔氏傳》，享保 17 年（1732）東都紫芝園藏版刊本。

<sup>113</sup> 莊兵：《〈孝經·閨門章〉考——兼論前漢中後期《孝經》解釋學的思想傾向》，《中國儒學》第 5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 年），頁 352-354。

<sup>114</sup> 據《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可知北朝人抄書有省略「也」字的習慣。

這樣，透過敦煌本《孝經》，對重新認識與界定《古文孝經》，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解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 （三）《御注孝經》

敦煌寫卷發現 1 件 S.6019《御注孝經（聖治）》，曾令陳鐵凡先生感到「殊為可異」，並質疑「今敦煌本孝經，御注僅存一卷，而鄭氏本則有十餘帙，意者，御注雖以功令行，而民間猶以鄭本傳授耶？」<sup>115</sup>但就至今發現吐魯番出土文書中還發現 3 件編號：《大谷》3279v、《大谷》5417(A)、《總目》Ch2547r 的《御注孝經》殘卷來看，則《御注》在西域的傳播狀況不似陳氏所言。

關於 S.6019《御注孝經（聖治）》殘卷的研究，英國翟理斯《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中，認為此卷「有注，出現在唐明皇御注《孝經》的初注本中」，最早判定其為唐玄宗的《御注孝經》。許建平認同翟理斯的判定，指出該卷相當於《覆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218 頁上欄 4 行至下欄 5 行，判定該卷為玄宗初注本，並將其名為「唐玄宗《孝經注（聖治）》」。<sup>116</sup>吐魯番出土 3 件《御注》附有元行沖《疏》，或為開元本，亦不能排除有天寶本。

中唐時期敦煌曾一度脫離唐王朝的控制，<sup>117</sup>而這一地區文教制度依然延續初唐時期的形式。開元中期之後，中原地區科舉經籍改為《御注》，敦煌地區在延續唐初文教制度沿用《鄭注》同時，亦開始推行《御注》，直至五代。這從敦煌吐魯番本《孝經》多見《鄭注》亦有《御注》的狀況可了解上述歷史事實。

《御注孝經》的傳播狀況，從敦煌相關的歌讚類寫卷描述來看，可能更具規模。P.2633、P.3386、P.3582、P.3910《楊滿山詠孝經十八章》是直接簡約《御注》的作品，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在民間便於傳唱與理解《御注》文意。<sup>118</sup>徐俊先生指出《詠孝經十八章》是楊滿山作於敦煌重歸唐朝管轄的宣宗大中年間。<sup>119</sup>

<sup>115</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序》，頁 2。

<sup>116</sup>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頁 419。

<sup>117</sup> 建中 2 年（781）再度為吐蕃佔領，唐宣宗大中 2 年（848），沙州人士張議潮募兵集眾起義奪回敦煌城，使河西地區重歸唐王朝。大中 5 年（851）唐廷在敦煌設置歸義軍，並任命張議潮為敦煌歸義軍節度使。

<sup>118</sup> 趙楠：〈論《詠孝經十八章》〉，《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總 25 卷第 5 期

P.2721《新集孝經十八章皇帝感》可見「新歌舊曲遍州鄉，未聞典籍入歌場。新合孝經皇帝感，聊談聖德奉賢良。開元天寶親自注，詞中句句有龍光。……立身行道德揚名，君臣父子禮非輕。事君盡忠事孝，感得萬國總歡情」、P.3910《新合千文皇帝感辭》可見「帝詔四海贊諸賓，黃金滿屋未為珍。……天寶聖主明三教，追尋隱士訪才人。……御注孝經先公唱，又談千文獻明君」等吟詠。從這些詩句，則能想象當時配合開元天寶《御注》的頒行天下，是如何以歌詠演奏的形式向庶民大眾推廣的盛況。

鄭阿財先生研究亦有明確，開元天寶年間的安西都護張嵩（或作張孝嵩）曾作《御注孝經讚並進表》，上奏希望在天下諸郡及督護府建置官學來推動《御注》的傳習。<sup>120</sup>這些皆足見玄宗《御注》在西北邊陲地區普及民間的情形。

而這樣的歌讚形式，某種程度呈現出《御注孝經》的權威性質。六朝至唐代多有皇帝親自講習《孝經》，至唐玄宗親自為《孝經》作《注》命儒臣製《疏》，並把《孝經》列為官學頒行天下，使《孝經》成為君主直接干預家族秩序的重要工具，《孝經》的重心亦從漢晉六朝的「孔子教孝」轉變為「天子教孝」。<sup>121</sup>《孝經》歌讚類作品的產生，與這樣的背景有關。其將《御注》經注改為通俗便於吟詠的韻文，並加入對皇帝的歌功頌德及對孝子忠臣的讚頌，既有因應民眾文化層次俗講經典的背景，亦不乏如邊臣張嵩那樣藉以宣揚中原皇帝的威德。

傳世的史誌傳記多有記載皇族貴胄及士大夫傳習《孝經》的紀事，對民間的《孝經》傳習情形記載不多，以上文獻則對此多有豐富與補充，顯現出唐代傳播《孝經》講習孝道的多種渠道及豐富形態。若將這些寫卷一併加以討論，相關《御注孝經》的課題研究，勢必更有拓展。

#### （四）《孝經注》、《孝經義疏》、《孝經疏》

六朝隋唐這一段《孝經》講習極為活躍、著述亦多，卻少有傳世資料留存，而敦煌吐魯番寫卷發現數種的佚名《孝經注》、《孝經義疏》、《孝經

（2004年），頁225-228。

<sup>119</sup>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253-263。

<sup>120</sup> 鄭阿財：〈敦煌寫卷「御注孝經讚並進表」初探〉，頁108、111。

<sup>121</sup> 陳壁生：〈明皇改經與《孝經》學的轉折〉，《中國哲學史》2012年第2期（2012年10月），頁50。

疏》，大都前所未見，從而引發學者的關注與討論。以下主要根據許建平先生的整理，<sup>122</sup>概述各卷的相關研究進展。

其一，S.6177+P.3378 佚名《孝經注》殘卷，由陳鐵凡先生綴合。<sup>123</sup>潘重規先生指出「伯三三七八寫本，是一個《孝經注》的殘本，沒有注者的名氏。其書雜引故事，發揮經義，所引的故事，很像小說家言……。考今行《孝經疏》，為宋邢昺增損唐元行沖《疏》所成。宋《崇文總目》云：『初，世傳元行沖《疏》外，餘家尚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遠。咸平中，昺等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我們看上引伯三三七八敦煌寫本《孝經疏》殘卷，大概就是《崇文總目》所說的元行沖以外的『猥俗褊陋，不足行遠』的《孝經疏》。但是蔓引故事，流於猥俗，顯然是受了唐代佛教徒俗講經文風氣的影響」。<sup>124</sup>許建平認同「此說極有見地，」據以定名 S.6177+P.3378 殘卷為《孝經注（開宗明義—三才）》，並考察卷中「但」字缺筆而「旦」則不缺筆，推定此卷抄寫時期不應早於睿宗時期。<sup>125</sup>

其二，關於 P.3382 殘卷的研究，許建平贊同《索引》以為此卷與 P.3378 是同書而不同寫本，抄寫時期亦不應早於睿宗時期。<sup>126</sup>傅振倫認為此卷為孔安國所注之《古文孝經》；<sup>127</sup>林秀一指出此卷「關於禮制的解釋長達二、三十行……帶有義疏性格，並且解釋受到五行思想、讖緯思想的影響濃厚，且有些部分晦澀難解」，從而推論乃是「六朝人的注解。」<sup>128</sup>陳鐵凡亦認為是六朝義疏之屬。<sup>129</sup>舒大剛對以上各說都加以否定指出：「此卷是『今文』經學家的作品，而不是『古文經學』的產物，更不能視為孔安國的注。同時，其中沒有受王肅的影響，也沒有玄學、佛學乃至道教的影響，因此作者不會晚於魏晉之後，其出現應在王肅之前，」並推論此卷可能是三國韋昭的《孝經解讀》。<sup>130</sup>許建平則列舉四點駁論，指出舒論「無法使人信

<sup>122</sup>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頁 421-425。

<sup>123</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序〉，頁 3。

<sup>124</sup> 潘重規：〈簡談幾個敦煌寫本儒家經典〉，《孔孟月刊》第 24 集 12 號（1986 年 8 月），頁 3-4。

<sup>125</sup> 張涌泉主編、許建平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4 冊，頁 1968。

<sup>126</sup> 同上註，頁 1976。

<sup>127</sup> 傅振倫：《敦煌寫本古文孝經殘卷一卷》，《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817-818。

<sup>128</sup> 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考〉，頁 36。

<sup>129</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考略〉，頁 2。

<sup>130</sup> 舒大剛：〈敦煌文獻伯 3382 號《孝經注》作者初探〉，《中華文史論叢》第 76 期（2003

服」，第一，舒論全文所討論《韋注》，不可認為與韋昭《孝經解讀》是同一本書；第二，義疏體裁起於六朝，儒家疏體乃仿佛家經疏而作。此注體裁明顯具有疏體的性質，三國時韋昭怎能作出這樣的疏體；第三，殘注辭極鄙俗，文多口語，不可能是注《國語》的韋昭所為；第四，援引潘重規評述此注「蔓引故事，流於猥俗，……其書雜引故事，發揮經義，所引故事，與俗講經文籍故事以宣揚佛理者，其用意正同，……似出於薰染佛家思想者之手」，認同潘論「真正抓住了核心……乃無名氏所作講說《孝經》的講經文」，並據此把該卷定名為佚名《孝經注（三才一聖治）》。<sup>131</sup>

其三，敦煌寫卷另存一卷 P.3274 佚名《孝經鄭注義疏》殘卷，王重民考察認為此卷「疏語頗似唐朝所撰正義，」因此斷定此卷為「元行沖《御注孝經疏》」。<sup>132</sup>王利器則認為此卷是《新唐志》所載孔穎達之《孝經義疏》；<sup>133</sup>陳鐵凡亦不認同王說，指出此卷體例「猶有六朝義疏之舊」，卷中引劉先生、賀步兵、袁司空，如林秀一考證為劉瓛、賀瑒、袁昂，疑作者可能是皇侃或其門生。<sup>134</sup>陳金木則針對此卷進行「經文」、「注文」、「所稱引皇侃《孝經義疏》之疏語」、「《孝經注疏》與此卷疏語」的分別考校，從而否定前述諸說，認為此卷為天寶元年以前所作，為疏解鄭玄《孝經注》之書，撰人未詳。<sup>135</sup>許建平認同陳金木之考證精細，並對此評價「雖未考定作者，然已否定王重民、林秀一之說，亦一大進步。」並據以定名此卷為佚名《孝經鄭注義疏》。<sup>136</sup>

其四，P.2757v 亦為新發現《孝經疏》，陳鐵凡云：「此卷面為道藏殘帙。書法秀麗，行款疏朗，有細線格。卷被滿頁皆字，未悉何書。自第十一行起為《孝經疏》，計九行。字迹極草率，紙色深赭。卷端之上，突出一小箋，長約一寸，寬四分。題曰『孝經疏』。王重民以為御注疏，經比勘校讀，知其非是。今據原卷筆錄於此，其殘泐磨損之處，以□誌之。……案此疏《喪親章》之文也」。<sup>137</sup>許建平根據黃永武說指出陳氏錄文 9 行之外，其餘內

年)，頁 225。

<sup>131</sup>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頁 422-424。

<sup>132</sup>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64。

<sup>133</sup> 王利器：《敦煌本孝經義疏跋》，《圖書季刊》新 9 卷 3、4 合期，1948 年 12 月，頁 2。

<sup>134</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考略》，頁 10-11。

<sup>135</sup> 陳金木：《敦煌本孝經鄭氏解義疏作者問題重探》，頁 147-192。

<sup>136</sup>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頁 425-426。

<sup>137</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考略》，頁 13。

容則均為齋文。並據陳論定名為《孝經疏（喪親）》。另外，此殘卷有書題標籤「孝經疏」三字，陳鐵凡注意到這一特徵，指出「若此凸出標籤，則僅此一見，」但許建平指出《周易注》寫卷亦有此類浮籤。<sup>138</sup>

以上新發現的數件佚名《孝經疏》的共通特徵，在於疏解《孝經》的義疏體裁。學者指出，「義疏」是南北朝時期經典註釋的流行方式，而南北朝之際《孝經》義疏不下數十家卻均已散佚，敦煌寫本的出現，為瞭解這類注疏本的特徵，第一次提供了範本。<sup>139</sup>但所謂「猥俗褊陋，不足行遠」云云，則不無比照儒家經學正統而立論，若非必以此為界定，而是將之作為歷史所產加以還原史實，或可展現出六朝隋唐的《孝經》傳播形式，具有更為多元的歷史樣貌。

## 結論

以上為本論針對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研究成果的初步整理。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之〈卷八·孝經〉統計出敦煌《孝經》寫卷共 41 號，這僅是藏經洞發現的數量，加上土地廟遺書 1 號、吐魯番出土的《孝經》寫卷 12 號，則西域地區出土合計 54 號。其他還有敦煌寫卷：歌詠、頌讚《孝經》類殘卷 10 號、學郎《孝經》策論草稿 2 號，吐魯番出土：學生所答《孝經》策問卷 8 號，這樣，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寫卷，合計達到 74 號，已具備獨立的範疇及研究規模。

敦煌吐魯番本《孝經》的發現，從輯佚校勘的文獻學研究至思想、民俗等研究，皆有提供重要的資料補充及新課題開展。尤其在六朝隋唐《孝經》學史研究方面，敦煌吐魯番本《孝經》對此期的文獻與課題不足提供諸多彌補。比如針對科舉經籍傳習的歷史真實樣貌考察、今古文的界定問題、乃至相關「義疏學」的課題探討，皆可提供新的認識。又，由敦煌文獻可以發現《孝經》在敦煌吐魯番等西域地區，與在中原一樣深具影響，是研究六朝隋唐文教風俗、孝道傳播的第一手資料。由此所引發諸如「《孝經》何以既有被當做廢紙製成冥器，又有被作為禳惡勝邪的神書的現象？」、「何以出現眾多的《孝經》歌讚？」等饒有興趣的問題，正待廣為深入的探究。並且，不僅敦煌寫卷以及吐魯番文書本身的歷史文獻價值

<sup>138</sup>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頁 428-429。

<sup>139</sup> 朱玉麒：〈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頁 173。

得重視，即便於研究視野與方法論方面，亦可期待新的開展。比如，藉由新發現的《孝經疏》的經注疏解形式，與十數件《孝經讀》的經注講誦情形進行類比對照，參以史傳記載搜求印證，則可更多了解《孝經》在當時社會各階層傳播講習的不同形態與訴求。這些課題的開展，對古代教育史與文化史研究，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 主要參考書目

### 專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頓換吐魯番學會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的部分）》14 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 年。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析、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文獻》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 年。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錄本）全 4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1996 年。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全 10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991 年。

張涌泉主編、許建平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陳國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臺北：燕京文化，1977 年。

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考古學特刊》第3號，北京：中國科學院，1954年。

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期刊論文

王利器：〈敦煌本孝經義疏跋〉，《圖書季刊》新9卷3、4合期，1948年12月，頁1-3。

朱玉麒：〈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9月，頁167-173。

李德超：〈敦煌本孝經校讐〉，《第二屆敦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編印發行，1991年，頁101-122。

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鄭注復原に關する研究〉，《孝經學論集》，東京：明治書院，1975年，頁65-108。

——：〈敦煌遺書孝經鄭注義疏の研究〉，《孝經學論集》，東京：明治書院，1975年，頁109-148。

金澐坤：〈《俄藏敦煌文獻》中的西夏科舉「論」稿考——兼論唐宋西夏的科舉試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4號，2010年3月，頁101-117。

柳洪亮：〈交河故城出土唐寫本《孝經》殘卷跋〉，《新出土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18-120、382-385、470。

高啟安、買小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獻》第11冊非佛經文獻輯錄〉，《敦煌學輯刊》2003年第2期，頁9-38。

張錫厚：〈敦煌本《詠孝經十八章》補校〉，《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頁88-91。

許建平：〈跋大谷文書中四件未經定名的儒家經籍殘片〉，《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4期，頁8-13。

陳金木：〈敦煌本孝經鄭氏解義疏作者問題重探〉，《嘉義師院學報》第4期，1990年11月，頁147-192。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考略〉，《東海學報》19期，1978年6月，頁1-14。

舒大剛：〈敦煌文獻伯3382號《孝經注》作者初探〉，《中華文史論叢》第76期，2003年，頁223-246。

- 趙楠：〈論《詠孝經十八章》〉，《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總 25 卷第 5 期，2004 年，頁 225-228。
- 劉波：〈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吐魯番文書唐寫本經義策殘卷之整理與研究〉，《文獻》2011 年第 3 期，頁 10-28。
- 潘重規：〈簡談幾個敦煌寫本儒家經典〉，《孔孟月刊》第 24 集 12 號，1986 年 8 月，頁 3-4。
- 鄭阿財：〈敦煌寫卷「御注孝經讚並進表」初探〉，《敦煌學》第 18 期，1992 年 5 月，頁 107-115。
- 韓峰：《敦煌本儒家文獻研究》，甘肅：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 年，頁 100-105。
- 嚴耀中：〈麴氏高昌時期的《孝經》與孝的觀念〉，《中華文史論叢》第 38 輯，1986 年 6 月，頁 275-282。
- 蘇瑩輝：〈北魏寫本孝經殘葉補校記〉，《大陸雜誌》第 20 卷第 5 期，1960 年 3 月；後收於《敦煌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年，頁 283-295。

## 附錄：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寫卷一覽表

地域	種類	卷號以及定名	合計	總計
敦煌寫卷	白文《孝經》26號，綴合成22件。	S.707+12911（聖治—喪親），S.728（開宗明義—喪親），S.1386（序—喪親），S.5545（卿大夫—三才），S.6165（廣至德—喪親），S.9956+5821（士行孝—聖治），S.10056A+10060B（天子—卿大夫行孝），P.2545（序—五刑），P.2715（三才—喪親），P.2746（紀孝行—喪親），P.3369/4775（開宗明義—喪親），P.3372（序—廣至德），P.3416C（序—喪親），P.3643p1（孝治），P.3698（序—喪親），P.3830（天子—廣要道），P.4628/Дx.02962（序），P.4897（序—開宗明義），Дx.00838（廣要道—喪親），Дx.00838（三才—聖治），Дx.04646（聖治）	54	74
	鄭玄《孝經注》9號，綴合成7件。	P.3428+2674（開宗明義—喪親），S.3824V/1（喪親），S.3993+9213（五刑—諫諍），P.2556p（喪親），Дx.02784（聖治），Дx.02979（聖治），Дx.03867（紀孝行，五刑）		
	唐玄宗《孝經注》1號1件。	S.6019（聖治）		
	佚名《孝經鄭注義疏》1號1件。	P.3274（開宗明義—喪親）		
	佚名《孝經疏》1號1件。	P.2757V（喪親）		
	佚名《孝經注》3號，綴合成2件。	S.6177+P.3378（開宗明義—三才），P.3382（三才—聖治）		
	歌詠、頌贊《孝經》類殘卷10號，10件。	P.2633、P.3386、P.3582、P.3910《楊滿山詠孝經十八章》，P.2721、P.3910、S.0289、S5780《新集孝經十八章皇帝感》，P.3816、S5739、S.3824《御注孝經讚》		
	學郎練習試論草稿2號，綴合成1件。	Дx.03895+Дx.03901《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論》		

	土地廟遺書：鄭玄《孝經注》1號1件。	敦研：0366（感應—喪親）		
吐魯番文書	白文《孝經》4號4件。	黃文弼發掘本（開宗明義），交河故城遺址本（諸侯—孝治），72TAM169：26（a）（開宗明義—聖治），72TAM169：84 高昌《孝經》	20	
	鄭玄《孝經注》3號3件	黃文弼發掘本（三才），66TAM67：15/1，15/2（感應—喪親），國圖 00109（卿大夫章）		
	唐玄宗《孝經注》3號3件。	大谷 5417（A）（廣至德），大谷 3279v（聖治），Ch2547r《御注孝經疏（五刑）》		
	《孝經解》1號1件。	60TAM313：07/3 高昌抄本《孝經解》		
	《孝經義》1號1件。	97TSYM1：12p《孝經義（序）》		
	考試時學生所大策問卷8號8件。	Peald7a，Peald7d，Peald7k（2），Peald7m，Peald7o，Peald7r，Peald11a，Peald11d《孝經》策問卷		
疑偽	首都博物館藏白文《孝經》1號1件	西晉·張儁寫本《孝經》殘卷	1	